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前沿 报告(2015—2016)

廉 敏^{*}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多个方面继续有所深入。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唯物史观的哲学反思日益集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史学的理论发掘日益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显示出创造力。

一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

这一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其次是对唯物史观所包含的、与史学相关的其他一些理论问题。

(一) 关于唯物史观

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展开。有关讨论无不体现出话题的针对性,即理论界对唯物史观认识与运用中存在着的种种乱象。对此,研究者的视角与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多数研究都不约而同地维护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

有研究从概念辨析的角度厘清学界对唯物史观的不同认识。如舒远招《略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与张奎良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认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表

^{*} 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

面有所区别而实质上同一的概念,不应当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而人为地造成理论分歧。再如,李弦、王让新《唯物史观是“历史观”与“世界观”的统一》(《长江论坛》2016年第2期)认为,唯物史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们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两种表述方式,不存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而王莅《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理论”——马克思叙述历史话语体系的命名问题》(《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6期)认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对具体历史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概念。

有研究通过与旧史观的比较来认识唯物史观。如王卫华《三大旧历史观批判与物化劳动——兼评在物化劳动理论上的误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认为,旧史观虽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有某些合理性,但是都未能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物化劳动,由此陷入理论困境;要克服困境,我们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并坚决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李娉《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历史观之比较》(《浙江学刊》2016年第5期)指出,与克尔凯郭尔将目光紧紧聚焦在个体身上相比,马克思坚信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与进步性,将人的解放与历史进程统一起来。袁杰《论物质劳动、精神劳动与两种历史观的关联》(《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认为,与旧史观把精神劳动作为历史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劳动的科学考察,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而劳动概念不断变化的内涵,将是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有研究通过探寻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与逻辑联系来认识唯物史观。如“现实的个人”说,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其他。(刘宗碧《唯物史观创立的论证环节和逻辑阶次——从“人本学”到“客观实证”的问题解析》,《凯里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如“生成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生成论的。所谓生成论,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生成的存在。人的存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隽鸿飞、郭艳君《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如“三大批判说”,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序列”(苏哲、金正连《现代性逻辑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早期三个未完成的批判计划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1期)。如“三部曲说”认为,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唯物史观和世界史观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整三部曲(杨志臣、孙明增《哲学革命之三部曲:社会实践观、唯物史观和世界史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发展历程再思考》,《科学·经济·社会》2016年第1期)。又如论证《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建构中的“重要理论环节”(石建水《〈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建构的必然理论环节》,《求实》2016年第1期);论证《历史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入阐发、世界史观的集中表述以及对民族国家形成史、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系统推进(李百玲《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与细节——〈历史学笔记〉中的唯物史观个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

其中,以“实践说”更为突出。例如,安启念《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价值》(《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认为,“劳动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科学地回答人的创造性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相互关系这一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卜祥记、陆雪飞《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与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全部根据就在于“把现实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作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的超越”。刘晨晔、王特《唯物史观主体实践的多元基础及其当代价值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则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确认了人的三大基本生存实践: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核心的劳动谋生实践,以人自身的生产活动为核心的生理延生实践,以自主自由活动为核心的休闲乐生实践。

有研究则通过后来的哲学、科技、考古等知识反观并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如刘雄伟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0期)回击了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普遍质疑;房广顺《从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历史发展的相关问题》(《理论探索》2016年第2期)认为,科技进步并未改变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演进的规律性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的论断;刘庆柱《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私

有制和国家起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史与人类史构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生产工具发展与社会形态变化密切相关这三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证实、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有研究试图辨析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及运用中的问题。例如，孙大飞《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融合：马克思历史观中国化的理论旨归》（《学术交流》2015年第12期）认为，当前对马克思历史观中国化认识的困境，在于如何克服马克思历史观的规律说与人学说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解决马克思历史观所蕴含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而这个问题解决思路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实践合理性反思。吴英《纠正关于唯物史观的几个误解》（《北京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4版）集中列举并端正了几种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认识，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绝非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并没有忽视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不是历史终结论、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何丽野《“物质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的一处疏漏说起》（《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指出，2015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范畴的论述中存在一处疏漏，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整体性的理解；我们需要重视物质观的“历史性”。孙大飞《传统本体论误读：马克思历史观澄明的现代存在论理路》（《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指出，西方一些学者从柏拉图—黑格尔主义传统本体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破坏力要大得多，这种视角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指认为一种先验抽象概念运动的逻辑演绎体系，但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属于上面所指认的那种传统本体论。

在有关讨论的基础上，2016年4月13日始，《中国社会科学报》连续刊登了有关唯物史观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第一篇《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总论》，内容包括：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旧历史观存在不可克服的根本缺陷；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第二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内容包括：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有机体；人类社会“最后动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合力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第三篇《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利益论》，内容包括：利益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利益实质是一种

社会关系;民生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第四篇《荡起幸福人生的双桨——人生观与价值观》,内容包括:人是什么;生从何来;死归何处;应做什么;人生观是指导人生的开关;世界观与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是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力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关于其他理论问题

除对唯物史观的整体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的是唯物史观所包含的其他理论问题,如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历史规律、世界历史、意识形态、历史科学以及方法论等。这里拟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方面来介绍。

其一,社会存在方面。

在这些理论中,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又属重点。有研究关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认识的变化与异同以及他人对马、恩社会形态思想的评价;有的研究关注了经典作家对社会分期的不同表述方式如“三种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等;多篇文章以及学位论文表达了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理解。就唯物史观中社会形态理论的得失而言,于金富《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东方社会形态与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的认识是有深度的。文章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结构与发展规律的一般原理;二是关于西方社会结构与发展规律的具体结论。前者具有普适性;后者具有特殊性。马克思还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论述了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固有特征与特殊的发展规律:1. 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2. 东方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3. 东方社会发展规律。文章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继承与创新,就必须努力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及东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认真研究亚洲及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亚洲及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规律,有效推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全面确立亚洲及东方国家社会发展规律的创新理论,构建唯物史观的崭新形态——“东方史观”。

就某一种社会形态研究而言,有关研究也是有所推进的。李何春《从所有制的角度解析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尝试从所有制的角度解析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

本质和内涵; 文章主张, 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原始所有制, 确切地说是土地公有制, 这可以避免五种社会形态说和六种社会形态说之间的争论; 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 建立在土地公有制之上的稳定共同体(部落或联盟)、通过农村公社结合各种部落的社会形态以及这种专制社会形态主要在东方得到体现。石然《列宁“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形态论》(《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9期)认为, 列宁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形态理论。王海明《资本主义萌芽概念分析》(《东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主张资本主义四个阶段论“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诞生”“资本主义社会诞生”。

对阶级理论的研究也值得关注。赵阳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的思想来源探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指出, 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 随着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就被人们提出来并从不同的方面做过探讨。杨春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的艰难探索》(《马克思主义学刊》2016年第2辑)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 并在1848年革命时期和巴黎公社时期得以应用和发展, 晚年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张夺、罗理章《马克思“无产阶级发现”的内在逻辑》(《北方论丛》2016年第2期)认为,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科学内涵的揭示, 经历了由哲学逻辑出场, 到人道主义本质呈现, 再到唯物史观真正发现, 最终的政治经济学科学论证的提升和转换。柴玉玲《从马克思到卢卡奇: 工人阶级概念的变化》(《党史博采》2016年第5期)认为, 马克思与恩格斯考察工人阶级的概念、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阶级的生产生存状况, 提出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解放的理论, 而卢卡奇的研究强调主观意识, 这是一个明显的重大偏移。

对历史规律的讨论, 如高楠《历史规律的“隐”与“显”: 从实证主义史学到辩证唯物史观》(《青春岁月》2016年第3期)。文章以西方历史哲学的纵向发展为轴, 通过依次对以兰克与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历史非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分析, 揭示出“历史规律”“由显至隐再由隐变显的动态脉络”, 进一步论证了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

还有研究关注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王彩凤、张壮、于红丽《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并用这一理论对全球化过程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及考察当代中国的发展。

其二,社会意识方面。

如何认识唯物史观中的意识形态,杨得雨《意识、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探究》(《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强调,如何对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划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永恒的标准;汤荣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涵摄社会历史观的进路》(《南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则从社会历史观的发展历程、对社会历史观的理论支撑点即人的问题的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起源及内涵、社会生活本质及其相关范畴等方面逐层深入地阐释了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依存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历史观的进步性。

如何理解经典作家所讲的历史科学,也有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张文涛《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的意蕴》(《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学科,特别不是指历史学,而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切科学,是一种广义的“历史科学”。游兆和《论历史哲学的本质及其与历史科学的区别——兼评学界同仁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解》(《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指出,马克思的学术立场在于批判历史哲学而建构历史科学;而国内理论界却长期存在对“历史哲学”“历史科学”等概念及其关系的误解;实际上,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历史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研究理路,也具有互异互补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其基本特征是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而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部类则具有超验性与思辨性。田江太《“历史科学”的双重维度及其辩证关系》(《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科学”概念具有科学和价值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过度科学化或过度人道主义化的倾向。

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总结经典作家的方法论。刘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探究》(《大连干部学刊》2016年第5期)认为,唯物史观方法

论主要包括的几项内容: 现实逻辑框架论、历史辩证分析论、历史动力推进论、历史主体创造论和历史标准评价论。胡刘《“资本批判”与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摆脱和超越以往那种始终保持“独立的哲学外观”的一般历史哲学而创立全新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科学”),其关键就在于实现了对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即以“资本批判”为深入历史深处的入口,把受资本支配的现代劳动作为“历史科学”的逻辑起点,进而由此展开对历史认识论原则内涵的科学阐发。付雨鑫《论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原则》(《理论观察》2016年第4期)认为,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形态的过程中遵循的四个主要的方法论原则,如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等等。

二 对中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

本年度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理论遗产的发掘上。其中主要又包括: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论认识等。此外,也需要注意我国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

(一) 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研究对象

其一,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的研究

有关研究或者以人物为对象,或者以派别为对象,或者以思想为对象,或者以时间段为对象,角度与层次各不相同。若干研究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新意。

关注个别人物在推动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及其比较研究的居多。像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李达等都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安雅琴《陈溥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李达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关系考——基于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考证了石川祯浩的“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的不恰当。单鹂娜、常江《马克思历史观的人类性与中国化——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认为,毛泽东在

革命实践历史辩证法的总体维度上,实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经济性与超经济性、唯物史观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双重统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成就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与开放性。叶楠《试论瞿秋白的社会历史观——在“后唯物史观”的背景下》(《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认为,瞿秋白首次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并把它们融入社会学中,这在近现代社会学史上是开拓性的。陈代湘、周接兵《毛泽东、蔡和森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指出,毛、蔡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对于今天我们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与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哈光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从李大钊到毛泽东》(2015年6月大连海事大学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的逻辑线索:李大钊进行了引入和初探、陈独秀与蔡和森等进行了传播和解读、瞿秋白与李达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和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戴开柱《马克思主义史家风采的全面展示——〈吕振羽全集〉出版述论》(《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论述了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学的卓越贡献: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正确方向;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论;首度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鲁涛《张闻天史学思想及其价值》(《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论述了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何亚云《改革开放后刘大年和黎澍的史学思想》(《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指出,史学界的改革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因各自史学理解认识不同产生争鸣;刘大年和黎澍的史学思想争鸣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回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与新启蒙、阶级史观与近代化史观等方面;这有助于我们探究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中国当代史学的走向。

对群体的研究体现了人物研究的新思路。例如,欧阳奇《论理论工作者群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以艾思奇和何干之、陈翰笙、吕振羽、周扬为考察对象》(《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指出,艾思奇和何干之、陈翰笙、吕振羽、周扬五位理论工作者在哲学和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领域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学术铺垫,这表明,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党的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群体的互相借鉴和依托必不可少。

对个别的重要的著作有新发现。例如，马先睿《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再解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集中反映了“一大”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认识和主张；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实践的一次尝试，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曾银慧《早期传播唯物史观的经典〈唯物史观解说〉》（《决策与信息》2016年第7期）指出，1921年5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唯物史观解说》是首本专门介绍唯物史观的普及性读物。

对非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关注体现了唯物史观传播史研究在视野上的可贵开拓。例如，李天华、郭广迪《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的唯物史观（1927—1937）》（《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指出，“在1927—1937年，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不少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出版或发表的经济学文献中仍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有的还介绍或分析得非常详细。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大体上也是正确的。其中，有人还对唯物史观持基本肯定态度”。陈闯《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对旧史学界的接收与整改——以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为中心的考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则以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为中心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对旧史学界的接收与整改，以期充分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复杂情状。

在整体把握上也展现出了努力与创新。例如，闵文杰《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科学内涵》（《老区建设》2015年第18期）试图论证，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认为中共成立初期（或中共一大、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王雪楠《“物”、“心”之辩：中国知识界的“唯物史观”解读变迁（1918—1923）》（《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试图梳理1918—1923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中“物质”与“人心”（即经济因素与人类意志）两个矛盾的不同认识。李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唯物史观认识的历史演进》（《科技创业月刊》2016年第6期）认为，八九十年代唯物史观从刚性规律回归。

刘爽《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研究、论述围绕唯物史观所展开的广泛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系统梳理中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对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科学内涵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还有对阶级思想传播的研究,如鲁法芹《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解读》(《党政研究》2015年第3期)、郭台辉和谢丽萍《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早期展开(1898—1921)》(《天府新论》2015年第3期)、杨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曾银慧与李春梅《唯物史观的经典中译本——〈阶级斗争〉》(《决策与信息》2016年第5期)、朱亚坤《传统、现实与策略:毛泽东有关雇农阶级归属判断再认识——基于对毛泽东1925—1939年间有关文本的扩展解读》(《人文杂志》2016年第9期)等,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以来我国接受阶级观念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运用阶级理论分析我国历史上的阶级问题。

其二,对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

1. 关于“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理论问题。对“五朵金花”的认识同时还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追溯了“五朵金花”的称谓及由来、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绽放的情况以及80年代以来对“五朵金花”的回顾和反思,认为“五朵金花”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其获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使中国史学受益甚丰。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超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裹挟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怎样评价其来龙去脉、怎样看待其学术影响,并非轻易能够完全说得清楚。经过一段时期对“五朵金花”的较多批评和各种评价之后,随着“五朵金花”蕴含的深层学术价值的渐次显现,其带给我们或许有更多的启示和思考。曹守亮《重视“五朵金花”研究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1日第4版)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而成功建构新话语、新理论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

成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五朵金花”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进行贯通性研究,不仅对历史提出新的解释,而且直面时代提出的诸如“中国能否现代化”等问题。“五朵金花”研究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培育当代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理论矿藏。

2. 关于社会形态理论

对我国社会形态学说的研究涉及社会形态理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社会史论战、社会史分期等问题。赵纪河《社会形态概念辨析——以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参照》(《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指出,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争议和分歧之所以产生,其理论起点是社会形态概念本身。商晓辉《论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形态的界定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才智》2015年第11期)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早期国家、酋邦理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形态研究对于推进先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是大量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最好说明。沈长云《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回顾了第三次即“文革”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可称之为“新时期”)发起的社会形态讨论,认为这次讨论突破了最大的一项思想束缚即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或曰“五种社会形态说”);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古代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且中国无奴隶社会说逐渐占据上风;尽管有关意见还不统一,但这只是对新事物的认识尚未完善的一种表现;作者个人比较倾向于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的研究

人物研究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点。鉴于有些人物已经在前文有所介绍,这里仅侧重史学方面;对吕思勉、毛泽东、郑天挺、华岗、何干之、张政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则略去不谈。

1. 对李大钊史学的研究

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深入到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例如,宋志明《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底色与亮点》(《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1期)认为“以传统哲学中的变易史观为第一道底色,以中国近代哲学新思潮中的进化史观为第二道底色,目标在于改造中国社

会,力求讲出中国特色”。鲍文欣《经济史观与宇宙大化: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认为,李大钊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间的矛盾”(在更为深刻的层面表现为“社会—历史视域与一体化哲学视域之间的冲突”);这一思想困境可以被视为此后辩证唯物论兴起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存在论基础的理论特色。

2. 对郭沫若史学的研究

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也是本年度获得最多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鉴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负面评价的学术环境,有关研究以阐发郭沫若史学的价值较为突出。

2015年11月27—28日,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郭沫若与新文化运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首届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杂志社的40余名专家学者、编辑参加了论坛。与会学者从历史学、文学、考古及古文字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围绕新文化运动视野下的郭沫若、开辟郭沫若研究新领域、相关研究议题的新进展、生平史料及文献考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了对郭沫若史学的研究。^①

研究者对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了正面的分析与评价,并且在论证方法上试图创新。张越《郭沫若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什么?——以民国时期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为中心》(《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1期)一文针对一直以来对郭沫若史学的各种评价及评价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民国时期郭沫若史学受到的各种评价为主要材料,重现郭沫若史学的建树在当时学术界所引起的各种反响,借以说明郭沫若史学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带来的贡献及其他。何刚《郭沫若与魏晋封建论者围绕汉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认为,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战国封建论代表人物郭沫若同异军突起的魏晋封建论者,围绕汉代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过直接的学术争鸣。在这场颇具民主平等之风的学术争鸣中,双方立论各有所重,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新启发意义的观点,共同推动了50年代古史分期讨论的热烈开展和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吴建良《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 参见何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首届青年论坛”综述》,《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1期。

的创造性贡献》(《兰台世界》2015年第25期)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内容,并且其对考古资料的应用、对“封建”概念的辨析、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及家庭结构的演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吴功正《郭沫若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得与失》(《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年第12期)认为,郭沫若的多项学术发明,解决了上古历史和美学史的分期问题,但其总体趋势走的是下坡路。何俊《一位斯洛伐克汉学家眼中的郭沫若——评杨玉英的〈马立安·高利克的汉学研究〉》(《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1期)从国外汉学家的角度梳理了青年郭沫若在1914—1924年的心路历程,尤其是皈依马列主义的转变过程(即先以唯美印象主义的面目示人,继而转向表现主义,最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郭沫若的历史剧又是一个热点,只是尚局限于文学视角。王莉娜《多角度看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指出,把历史剧看成是影射现实的一种途径,使抗战时期历史剧的研究局限化;从多角度去评析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创作背景、创作意义、创作意图等,不仅使我们可以正视抗战时期历史剧的价值,也可以深层次地从内涵和本质上发掘历史剧的功用。

3. 对范文澜史学的研究

范文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有关研究虽然不多,但不乏深见。林国华《范文澜与中国革命史学之建构》(《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指出,范文澜最主要的成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特别注重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对于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若干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创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样的革命史学本质上是民族主义史学,同时范文澜史学具有战时史学的特性;当前反思和评价范文澜史学成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周文玖《范文澜与经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指出,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次系统梳理和演讲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对经学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对蔡和森史学的研究

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贡献得到学界关注。郭国祥、余薇《蔡和森对早

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8期)指出,蔡和森明确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从广阔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革命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及其特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独特的阶级、经济和政治背景;揭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指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并运用历史分析方法、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和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指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意义,认为研究中共党史不但能够弄清历史真相,而且对党员个人成长、把握党的事业发展规律具有突出意义。还玉婷《刍议蔡和森开创党史学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分析》(《党史文苑》2015年第10期)指出,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辩证分析法,对当代党史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5. 对翦伯赞史学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翦伯赞的研究从较多角度(如历史观、民族史、经济史)展示了有关研究的深度。黄文丽《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的交锋——翦伯赞对胡适实验主义史学的批判》(《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指出,翦伯赞对实验主义史学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派与实验主义史学派交锋和沉浮的缩影;这种批判主要源于两大学派历史观以及由此衍生的治史方法的差异,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贾益《翦伯赞的台湾“番族”考——兼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兰州学刊》2015年第9期)通过对翦伯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著述的梳理,认为这个时期他已经形成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史研究思想与方法论。具体包括:从一定历史阶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民族历史问题,民族学理论和资料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史实印证作用,以及中国各民族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写作的重要性等;翦伯赞对台湾“番族”的专门考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李健美《翦伯赞民族关系史观探析》(《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研究民族关系史时,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从自身的民族背景和历史事实加以论证,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友好共处为核心,正视民族之间存在的矛盾,肯定各民族

共同创造汉族的事实，将爱国主义教育 and 民族史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原则、两个核心、三个理论说。他的民族关系史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中國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起了促进作用。罗运胜《翦伯赞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探析》（《兰台世界》2015年第28期）指出，翦伯赞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长期受到忽略，但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十分重视的，其特点是：掌握的经济史资料翔实多样、阐发的社会经济史理论深刻、学术视域宽广。

6. 对侯外庐史学的研究

对“五老”之一侯外庐的研究在总结与深入两个方向都有新的进展。在总结方面：2016年1月，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全33卷）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侯外庐的著作与对侯外庐思想的研究两部分，前者收录了侯外庐自20世纪20—80年代的论著译作，后者收集了海内外学者研究侯外庐思想的代表性文字，共33册，1080万字。整理者按照经济学、史学（社会史、思想史）、哲学、时论、杂著等类别依次排序，对他的著述进行全面性的发掘和整理，不但填补了侯外庐史料的空白，而且厘清了侯外庐的思想脉络，让研究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侯外庐思想的发展轨迹。^①张岂之《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光明日报》2016年1月6日第14版）指出，侯外庐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享誉学林的侯外庐学派，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海晏《社会与观念之间——重读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第10版）指出，侯外庐先生开创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兼具中学与西学、史学与哲学、“横通”（思想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与“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多重学养，《中国思想通史》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在深入方面：于佳彬《普遍与特殊之间——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治史路径》（《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认为，针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侯外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对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给予认同，又能够以“路径”说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这些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

^① 胡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评〈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光明日报》2016年2月23日第10版。

究在民族意识与史学理论上的自觉阶段的到来。刘军《侯外庐的早期启蒙思想学说》(《华夏文化》2015年第3期)认为,侯外庐第一次提出和系统地论述了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成为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具有非常高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7. 对李达史学的研究

对李达史学的研究持续加强。鲁涛、汪信砚《论李达的史学修养》(《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发掘了李达良好的史学修养:史德方面,他尊重事实,反对空谈,主张“求真”“求是”,还特别“关注现实”;史学方面,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拥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厚重的学术积累;史识方面,他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善于发现问题;史才方面,他拥有很强的驾驭史料与表述史实的能力和才智;这些修养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深刻理解。鲁涛《李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指出,李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进行人物评价,主要包括:热情讴歌具有“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革命者;充分肯定“反抗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以及人民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批判英雄史观和生物史观,但又不否认伟人和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

8. 对白寿彝史学的研究

对白寿彝史学的研究以高屋建瓴者为瞩目,以具体研究为量多。前者如邹兆辰《关于“白寿彝学派”的初步思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可以有学派;北京师范大学确有白寿彝治学的思想、理念、风范的氛围存在,这些与白先生具有师承关系又坚持“白寿彝史学”的基本理念的学者,就形成了“白寿彝学派”。“白寿彝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也是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文章并深入总结了白寿彝学派的基本特点、学术成就以及意义。后者如刘惠、柴小君《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浅论》(《兵团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发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研究民族史问题(如民族形成、民族平等、民族关系和爱国主义思想)等,对当代民族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其他研究则涉及白寿彝的《三国志》研究、战国与秦汉时期私家著述研究、回族史研究、历史文献学观、历史文学观、

干部的历史学习等具体内容。

9. 对刘大年史学的研究

2015年8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纪念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①王伟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纪念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第1版)、张海鹏《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立个框架——刘大年先生对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北京日报》2015年8月17日第20版)对刘大年的史学贡献进行了总结:在史学研究中自觉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专门著文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前进的动力、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一个合理的框架、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等。

除此之外,学界对其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的价值阐发也是值得重视的。黄广友《学术与政治——刘大年史学研究风格简论》(《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指出,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这也是他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的学术风格;然而,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能像刘大年那样终其一生始终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却为数不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牵引是刘大年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史学研究风格中最为鲜明的大概莫过于其突出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革命史范式。他的史学成就证明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甚至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样可以有学术发现,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四,其他研究

还有些研究的规模虽然不足以成为一个类别、却不宜被忽略,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研究、对当代史学动态的观察、对期刊作用的研究、专门史领域的理论状况,等等。

1.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研究

2015年12月,于沛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研

^① 邓之滢《一名“战士型”史学家的“大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7日第1版。

究实践的发展历程做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其中也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该书的内容依次是:唯物史观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美国、加拿大、苏联、波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唯一一部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学术史专著”^①。这项成果注意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重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不是空泛地从概念到概念;这套书有针对性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关注,既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世界性,也从实际出发注意到其特殊性;此书尽可能从多国史学的角度反映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广泛影响;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的总结和回溯,可以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临的现实任务。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②。

李孝迁《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本中国现代关于史学评论(被理解为“反思”)的文章汇集。该集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五四”以来至1949年之前的反思文章,有助于今人领略中国现代史学的多样而丰富的面相。全集收录文章49篇,许多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较高。该编只收录综合性的评论文章,不包括单独评论某位史家或某本史书者。

2. 对史学动态的研究

王健主编《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介绍了近年来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等中国史学科动态,剖析了学术前沿的进展状况和重要的热点问题。该书以目前学科分类和学科现状为依据,力求方向全面和重点突出相结合,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相结合,研究理论和方法示范相结合,入门与提高相结合,主要按中国史二级学科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史学理论、专门史等展开,又兼顾横向的城市史、区域史、文化史、医疗卫生史等专门领域,

① 《导言》,第1页。

② 《序》,第1页。

主要介绍近五至十年中国史学界的理论前沿问题，在翔实的叙述中引导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3. 对期刊的研究

根据张秀丽《“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历史学的开创、发展与革新学术研讨会暨〈史学月刊〉创刊65周年座谈会”综述》（《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这次会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刊物的创办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期刊评价报告（2015）》先后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求是》杂志社等20家单位进行了专题调研或征求意见，与40余位知名学者进行了4轮17场次的座谈，对14种主要期刊、3.7万篇论文、500余家发文机构及6类作者群体进行了研究分析。《报告》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坚持强烈的问题导向，高度关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现实问题；注重评价的开放性和公正性，处处体现严肃的科学精神，以精准扎实的数据支撑起每一个判断和结论；坚持严谨的逻辑性，从各学科或专题期刊的基本情况、发文情况、作者情况、关注热点和存在问题与建议五个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完整展现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状况。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期刊评价系统研究，对于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方向，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权威评价体系，占领马克思主义学科评价的研究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4. 对专门史领域的理论研究

郑睿《马克思主义史观观照下的中国早期电影史学写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当代电影》2016年第2期）。分析了中国早期电影史写作中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观念与方法，比如运用民族矛盾与社会冲突的观点、重视经济因素等。

（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研究对象

总的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数量少、视角偏，但从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面貌。

在哲学史研究方面，衣俊卿、T. 布克辛斯基、张笑夷的《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激进的理论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包括了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与现代理性文明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

义重要理论著作研究、波兰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与当代进展等内容。黄其洪、牡丹《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与“文化唯物主义”——汉语学界 E. P. 汤普森哲学思想研究》(《现代哲学》2016年第1期)认为,未来需要树立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文化发生学研究”的立场,强化对汤普森历史性思想的研究,加强对汤普森阶级学说、文化学说及历史研究的统一性的研究。

在史学方面,王志刚《城市空间与工人阶级早期形成史的重塑——评卡茨纳尔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8期)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一书通过回溯与重建19世纪工人阶级早期形成史,认为“阶级斗争”要获得自身意义,就必须根植于阶级形成的空间化过程,根植于国家在城市舞台上的新角色及其效果;该书的贡献在于,试图通过城市空间这个概念中介,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主流社会学长期存在的存在/意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行动、必然/偶然等二元概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朱孝远、周施廷《知识分子的信仰、大义与家国情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学家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5期)则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学家们的个人选择表明,历史学家们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行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出一个真理: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一场世界性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三 中国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一)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1. 社会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何艺培《我国最早的阶级社会——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研究》(2016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依照《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古代社会》等著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引用陈铁梅的《定量考古学》中的一些理论,采用统计与定量的方法来分析整理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认为齐家文化时期社会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开始由农耕文化向混合的农牧文化转变,社会私有制已经确立,我国最早的阶级与最初的国家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可以说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诞生标志,齐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直接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模式。张碧波《中华早期文明模式初探——基于马克思“亚

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认为,从女王模式、黄帝王国的战争模式、良渚文化的玉琮模式及唐尧王国的部落联盟转型模式等例证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早熟性的主要表现: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公社过早解体,酋邦—国家提前产生;未待土地私有制成熟,原来的军事领袖即已成为酋邦—国家的君王,而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这一结果,是借助政治权力而不是依靠生产与贸易来实现的;以血缘、宗族所维系的政体结构,奠定了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姓氏系谱制度和“家天下”观念的基础;王者兼巫者“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独占通天的权力,而“天人合一”既是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李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提出,西周国家最好可被表述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

李根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形成若干问题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地主阶级。文章认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循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线进行:前者由民间土地私有化和农民的分化所导致,是经济的原发进程,它所产生的第一批庶民地主在战国以前即已出现;后者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设置有关,是继发性进程,战国的名田制和授田制所催生的既有身份性地主,也有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地主阶级中基础性的成分;身份性地主初期主要是军功地主,后来主要是官僚贵族地主。官僚的食俸和贵族的食封均源于国税的分割,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他们一般都要按庶民地主的方式置办私田,实行租佃或雇工剥削等,从而成为完全意义的地主。这也是在战国沦亡后一批六国封君贵族能够较快豪民化的原因所在。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赵党留《中国近代化的酝酿——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向西方学习”》(《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以为,在清朝统治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就已经在酝酿:一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缓慢发展;二是鸦片战争前后“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萌发与实践。董文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产生的独特历史现象》(《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7期)认为,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于19世纪40年代首先在外商企业中产生(即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在反封建的同时担负起反侵略的任务、农民阶级提出《资政新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后产生的一些独特的历史现象。

2. 思想文化研究

关于传统文化,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该书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放眼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既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又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评价,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方式,对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出了系统阐述。

有关研究又以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研究较为突出。季卫兵《解析民族精神:重建唯物史观的视角》(《学理论》2016年第5期)认为,无论是从受教者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解读民族精神是合理的选择。权麟春《民族精神历史演进及其认同》(《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演进的历史为:古代传统中华民族精神、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中,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为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精神。刘开军《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评瞿林东教授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刊)认为,瞿林东教授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历史文化认同”这个概念的解释、大一统局面与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相辅相成的关系、分裂时期历史文化认同所采用的独特方式、对历史文化认同的叙述方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优点与特点。李治亭《清代满汉民族认同与“互化”的历史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运用史实来论证满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主张“互化”说来端正“新清史”对满学、清史的误读。

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研究以晚清、民国为多。文炜《东亚近代化历程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尝试比较——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与朝鲜甲申政变为例》(《才智》2015年第10期)认为,朝鲜的甲申政变与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在主力、过程与结果上都有差异,但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而且都在强大的敌对势力反扑下失败,都是两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孟永《阶级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新文化运动观考论》(《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

新文化运动观奠基于瞿秋白、成形于陈伯达、定型于毛泽东，其最大特点是在阶级革命视域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继承。张文涛《断裂中的延续：新文化时期新旧文明转变中的阶级观念》（《天府新论》2015年第5期）认为，将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期，在廓清时代主流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国人在接受新旧文化中的断裂感；民主观念与阶级观念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其间的复杂关系在新文化时期国人所向往之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显而易见。

（二）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1. 对历史学理论的思考

2015年8月23—29日，由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2016年9月8—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举办等，这些事件对历史学建设的推动可想而知。学者发表了诸如“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①“历史学家有国籍，但历史学没有国界”^②“当代中国历史学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为人们认识当代中国提供历史视角和历史逻辑的重要使命”^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完整统一、独具特色的历史观”^④等见解。

在国家政策环境的推动之外，史学理论自身对历史学也有深入的思考。例如，赵轶峰《“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热推出了许多史学理论著述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沉淀下来，其最大的意义毕竟还在于史学界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冲破教条主义，二是实现中国史学观念、理论同国际学术的衔

① 张海鹏《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光明日报》2016年7月27日第14版。

② 赵秋丽《张海鹏：历史学家有国籍，但历史学没有国界》，《光明日报》2015年8月26日第9版。

③ 曹守亮《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岭南学刊》2016年第5期。

④ 邱婷《习近平历史观的当代运用》，《天中学刊》2016年第5期。

接,三是史学理论的多元化,四是史学理论成长为一个学科;史学理论要推进,就要直接面对当代世界范围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而这类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认识论、知识论层面;历史学永远需要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保持警觉。再如,彭卫《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再论历史学的实践性》(《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两篇文章结合中西史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运用中西尤其是西方史学材料,试图回答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即历史学的实践性问题;文章认为,历史学的“致用”不是将历史简单地与今天比附,也不是将历史知识作为应付当下的实用工具;历史学的实践性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关注,如明了我们生存的文化根脉;明了我们漫长的发展路径;明了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向哪里去,如何去,等等;而历史学的实践性存在一个有效范围,即历史学的实践性必然集中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方面而不是其他。薛国中《历史科学的使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4期)认为,汉代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了历史学的使命,即:探究自然与人类及其社会的关系,梳理两者历史发展的事实,通晓自古及今历史演变的脉络,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人类生存、生活不可或缺的借鉴,进而展望人类未来的前景。又如,张顺洪《世界历史学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认为,“世界历史”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二是避免任何形式的“中心论”;三是要努力克服阶级和民族的局限性,坚持科学性。

对人物评价的讨论可以说是其中迫切、热烈且最接地气的内容。除专家、学者外,很多中小学历史学教师活跃在这个领域。有研究指出当前人物评价中出现的问题,如:戴茂林《党史人物评价中的“隐性”抹黑不应忽视》(《理论视野》2015年第5期)以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出版的《国史札记》(人物篇)一书中的两篇文章为例,评析当前在党史人物评价中由于方法论的错误所导致的乱象及其影响;文章指出,“以人论史”并不能科学揭示新中国的政治走向“以言画人”只能是以偏概全“以讹传讹”必然制造更大的混乱。孙钦梅《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6期)认为,研究者在评价过程中未能坚持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吴勇军《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实践性认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6年第12期)认为,历史人物教学中对阶级分

析法的理解受惯性思维的影响是教条的。王雷《高校历史教学中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与民族史观问题的探讨——以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为例》(《内蒙古教育》2016年第1期)针对社会热点对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端正的思考。有研究试图分析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方法,如:程恩富、詹志华《确立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第4版)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必须综合运用历史性、客观性、阶级性和价值性原则,根据具体史实进行具体分析;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明确执政合法来源以及开创未来发展道路都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倪延年《评价新闻史人物的五个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1日第6版)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有研究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经验总结中获得启发:王路坦《论邓小平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认为,重温邓小平知人论世、求真务实、鉴往知来的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方法,对于引领社会思潮、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俊生《论习近平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和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刘敏《如何评价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不”思想运用》(《教师教育》2016年第1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其“五不”思想(不能错定历史坐标、不能忽视历史进程、不能割裂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历史事件的成败不能与单个历史人物画等号、不能戴有色眼镜)值得我们参考。

历史观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王洋《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历史观教育探析》(《文教资料》2016年第1期)认为,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下,大学生历史观教育面临着唯物史观教育重视不足、两课教学现状亟待革新的问题;加强与改进大学生历史观教育不仅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

2. 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认识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该书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辨析、研究和批判西方普世价值方面的文章50余篇,具体包括西方普世价值的源流与本质、对普世价值谬误的分析、对西方政治普世价值的批判、坚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自信等部分。

在理论上有所推进的,如王成军、刘星星《用唯物史观克服“元史学”理论弱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第5版)。文章指出,“元史学”是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元史学”的观念来看,现代史学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对“元史学”的不同建构和理解造成的。“元史学”理论虽然有其突出的理论价值,但由于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建立在西方文化轨迹上的弱点,即历史的存在不是从历史本身得到依据,而是有意无意地从哲学中加以寻求;正是如此,现代西方史学的突出特征是偏重于人的精神观念和个体的思维,而对个体思维的精神观念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加以淡化,终使“元史学”难以具有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只能沦为形式的或抽象的概念;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用历史的逻辑和辩证的方法来探讨“元史学”理论,不仅是克服“元史学”理论弱点的基本途径,而且也是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又如王莉《唯物史观视域下德勒兹的社会历史观》(《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文章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了德勒兹的社会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社会历史观,也有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10年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入选的46篇文章是从数百篇文章中精选而出,具体包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抗战历史不容歪曲、反对在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部分。

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历史虚无主义?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指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国际学术界进入衰退和分化时期,在中国却还在发展中,历史虚

无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其影响不可轻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概念、范畴和历史叙述等方面，但首先表现在历史观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以及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碎片化，就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李士坤《历史学的“月亮问题”——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剖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如何看待历史事实”变成了历史学中的核心问题，目前中西方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全部分歧和争论无一不与此问题有关；以历史学中的“月亮问题”为典型案例，可以将问题还原为主客观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文章提出，把“月亮问题”简单地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卡尔等认为历史事实根本不存在的论断，没有区分现实当下的存在与过去的存在；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头脑中的说法，是没有区分事物的存在与观念的存在两种存在形式；决定历史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事实历史的客观性归根到底就是讲事实历史的客观存在性，它之所以是客观存在的就在于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 and 轨迹，这种方式 and 轨迹是以以往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为载体的；事实历史的客观性还指，历史事实的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事实历史的客观性还表现在它们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即规律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绝对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从不同角度否定事实历史的客观性与可知性，其实质是黑格尔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翻版，将会导致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

此外，张劲《坚持唯物史观反对虚无历史》（《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刘先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重构——兼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价值悖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何沙沙与胡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及其应对》（《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3期）在各自关注的问题上也都有一定的见解，且论证有力。

4. 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保民《教条主义根源论》。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直面当前社会和理论界存在的相关现实和

敏感问题,从多种学科和多种视角对教条主义根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探讨。全书分九章,分别从教条主义研究的现状、教条主义范畴的再解读、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制度根源、意识形态根源、宗教根源、文化根源、认识论根源、方法论根源,教条主义的防范等方面,进行了翔实具体的深究。注重综合性分析,凸显学理性论证,展示辩证性阐释,以拓展社会对教条主义问题研究的视野,从而深化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教条主义的继续研究。

5. 意识形态的建设

王智《1949—1976年:中国社会结构转换中的意识形态取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1949—1976年的意识形态历经扬抑过程:其前期旨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造就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内核;后期则逐渐导入摇摆路径。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于2016年2月由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用一百个专题叙述了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全书开创了以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的先例,以历史普及化的方式传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四) 对外国历史的研究

外国历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所助益的,这里试举几例代表性文章。李怡净《尼罗河灌溉工程与古埃及的国家治理——兼论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与社会形态》(《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基于尼罗河自然灌溉和水利灌溉的思考,探究水利灌溉工程对古埃及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以及在农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雷玉明、李彤宇《印度农民运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印度农民运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着

微妙的联系，后者始终对前者有影响，但始终没有成为印度农民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是：在印度现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历程中，印度农民形成的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关注民族独立；印度“新阶级”逐渐掌握独立运动领导权，农民运动最终汇入独立运动大潮；早期印度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取得印度独立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兴起并没有改变印度农民运动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的关系。徐成芳《世界主要国家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观述评》（《大连干部学刊》2015年第6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对于法西斯战争的看法分为两类态度、五种历史观：一类态度是反对态度，即反对法西斯战争，这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民意；一类是美化的态度，主要有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和西欧的极右翼势力，这在世界上是支流和逆流；五种历史观指：能够正确对待“负面资产”的德国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观“承认侵略”与“否认侵略”并存的日本战争历史观“实用主义”的美英法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观；坚定明确的苏联及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观；捍卫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观。

四 总结

上文试图呈现这一年度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著述与创新之处。有关研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诸多理论中偏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学科分化的局面，史学领域尚待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历史、并以历史研究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在更大程度上仍然任重道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关注。

课题组成员：杨艳秋 徐歆毅 廉敏 高希中

执笔：廉敏